

公平感知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社会比较的作用^①

杨浙帅¹, 戴思琦¹, 赵旦^{2*}

¹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²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目的] 近年来不断创新低的生育率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发严峻。本研究旨在探究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因素。[方法] 本文基于 3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 31125 个样本和一系列实验研究揭示了社会公平感知和个体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心理机制。[结果] 本文发现提升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能够减少向上的社会比较, 使预期的生育成本下降, 进而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最后, 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社会比较方向(向上的社会比较 vs. 向下的社会比较)对上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论] “公平”、“平等”是共同富裕的核心, 本文使用大样本数据建模和实验范式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并根据具体心理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有效落实生育政策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平感知 生育意愿 社会比较 生育政策

分类号: F713.55; C934; C91.6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 2020 年我国的年总和生育率为 1.3, 这一水平也是联合国报告中通称的“极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 (林宝, 谢楚楚, 2019)。长期低生育率会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 阻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邢采等, 2019)。因此人口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 2022)。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很多, 以往的研究发现了很多生理、经济、文化、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因素 (吴帆, 2020; Miller et al., 2010), 但前人的研究并没有检验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没有深入解释公平感知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社会公平感知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是指个体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整体感知和判断, 即人们对于社会是否符合“应有的社会状况”的判断 (胡小勇等, 2016)。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冯霞, 苏振华, 2021)。研究发现当个体的感知不公平增强时, 他们的社会比较倾向 (social comparison) 也会随之增加, 为了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个体会更加关注社会中较富有的一些人, 并频繁地跟比自己富有的人进行比较, 增加向上的社会比较的频率 (Cheung & Lucas, 2016)。这种向上的社会比较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会导致人们感知的生活成本、育儿成本增加 (Gerber et al., 2018), 而生育多个孩子是一个长期的、高投入的决策, 处于相对劣势的人在短期内无法弥补

①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02205-N72201)
通讯作者邮箱: zhao_dan515@163.com

自己与富人之间的差距 (Smith, 2000), 进而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因此, 本研究提出社会公平感知的提升能够减少社会比较, 进而增加个体的生育意愿。

本文首先用大样本保证了结论的外部效度, 又用一系列随机分组、严格控制环境的实验保证了结论的内部效度。研究 1 采用了一个大样本的数据建模展示了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 随后 3 个实验研究验证了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接下来, 本文首先回顾相关文献。

1 文献回顾

1.1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自 1936 年美国学者 George Gallup 在一项关于理想家庭规模 (ideal family size) 的民意调查中首次使用了“理想子女数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的概念之后, 生育意愿的概念就在生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Trent, 1980)。Miller 等 (2010) 认为, 生育意愿是从生育动机转变为生育行为的中间状态,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能够稳定地预测个体的生育行为 (Schoen et al., 1999)。因此探讨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因素, 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 对促进最终的生育行为有重要意义。

以往探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三个理论视角进行归纳。第一是生物人口学的视角。生物人口学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生育行为是受基因控制的 (Rodgers et al., 2001), 人口统计学因素, 如生育年龄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Gray et al., 2013)。第二是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structural approach)。该视角关注了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陈建新, 王莉君, 2021; 张冲等, 2019)。其中经济方面, 一系列研究验证了经济形势恶化、收入不足、住房紧张、失业等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第三是社会心理学视角。有关生育意愿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发展出了三个相对成熟的解释框架: 协同作用理论 (theory of conjunctural action)、性格-欲望-意向-行为序列模型 (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 Model)、和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协同作用理论主张人的生育意愿是受到很多外部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在无意识中产生的 (Balbo et al., 2013)。性格-欲望-意向-行为序列模型将整个生育行为看成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Miller et al., 2010)。计划行为理论把生育决策看作一种有计划的理性行为, 认为个体的生育意愿取决于成本收益、社会规范和个人控制力这三方面因素 (Ajzen & Klobas, 2013)。

从内容上来看, 上述三个视角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研究了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绝对的经济发展与个体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比如总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会降低生育

意愿，个人资源的匮乏也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等（Rayhan et al., 2018; 张孝栋等, 2021）。然而，极少有研究关注个体对经济发展的相对公平感知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没有研究系统地揭示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

1.2 社会公平感知与社会比较

“公平”、“平等”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提升人民的社会公平感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目标（郁建兴，任杰, 2021）。学界对社会公平感知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一系列研究都在关注公平感知与个体目标设定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发现当员工感知到不公平时，他们的目标达成率就会降低，其工作绩效也会显著下降（Austin & Walster, 1974）。近年来，学者们将公平感知的研究情景扩大到了组织之外，开始研究社会公平感知对个体其它行为的影响。比如陈成文和张晶玉（2006）主要研究了社会公平感知对公民纳税行为的影响，发现感知公平能够增加公民依法纳税的行为。杨奎臣和胡鹏辉（2018）探讨了社会公平感知对个人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发现了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加人们的环保行为。

此外，有研究发现公平感知能影响个体的社会比较频率和倾向（Newman et al., 2015）。社会比较的概念最早是由 Festinger（1954）提出的，是指个体利用他人作为比较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的过程，能够帮助个体更加精确地了解自己的现况。社会比较具体又可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即同比自己条件好的人比较）和向下的社会比较（即同比自己条件差的人比较）（Buunk et al., 1990）。Cheung 和 Lucas（2016）在研究中证实了不平等与更频繁的向上比较之间的因果关系。类似的，Schor（1998）也发现感知到不平等会引起人们更加频繁地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因为不平等的感知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中特别富有的一些人，从而导致人们会频繁地与那些富有的人进行比较，增加向上的社会比较频率。

从人类进行社会比较的最初动机来看，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信息从而能更加精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在社会中的地位（Gilbert et al., 1995）。当人们感知到社会相对不公平时，人们会更加频繁地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从而不断获取信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人们感知到社会相对公平时，自己与他人的地位差距不会那么巨大且相对稳定，因此也不需要通过频繁的社会比较确定自己的位置（Goya-Tocchetto & Payne, 2022）。生育多个孩子是一个长期的、高投入的决策，处于相对劣势的人在短期内无法弥补自己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很难改变差距的情况下，向上的社会比较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Smith, 2000），进而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比如在比较过程中，个体可能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自己的同事、朋友或者邻居，在考虑是否生更多孩子的时候，这种比较就会引导个体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像其他家长一样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相反的，在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时候，个体的社会地位差距没有那么大且相对稳定，个体在考虑是否要更多

孩子时就不大会和他人进行频繁的社会比较，因此也就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社会公平感知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感知公平能增加个体的生育意愿；

H2：社会比较中介了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社会比较具体可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和向下的社会比较。一系列研究都发现人们通常情况下会同能力水平比自己好的人进行比较（Gruder, 1977）。这与上文提到的人们在感知不公平的时候会更频繁地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相契合。

社会比较的方向会影响人们认为自己相对更差或更好的感知，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Schlosser & Levy, 2016）。向上比较会导致负面的自我评价，进而导致自我怀疑（Midgley et al., 2021）。在生育决策中，生育多个孩子是一个长期的、高投入的决策，处于相对劣势的人在短期内无法弥补自己与富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很难改变现状的向上比较便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Smith, 2000）。即当个体感知到社会不太公平且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时，个体会觉得生育成本增加。这种长期的、高投入的差距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导致个体感到自我提升非常困难从而转向降低当前生活成本，在无力给孩子提供像别的富人家一样的条件时就选择减少生育。然而，如果个体感知到社会不公平但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时，个体掌握相对优越的条件，不会明显感到生育成本所带来的过大负担，因此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人为地操纵个体的社会比较方向，就很可能削弱社会公平感知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确实是向上的社会比较在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了中介作用，我们采用了机制调节设计（moderation-of-process design）来检验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Spencer et al., 200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 来进一步检验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

H3：社会比较的方向能够调节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个体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时，社会公平感知越高，个体的生育意愿就越高；当个体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时，社会公平感知程度对个体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2 研究 1：CGSS 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

研究 1 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简称 CGSS2013、CGSS2015 和 CGSS2017）。研究 1 的目的是使用最新公布的三期 CGSS 数据检验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保证本文结论的外部效度。

2.1 数据来源与选择

本研究所使用的 CGSS 数据涵盖了我国 31 个省（市、区）的城市和农村，共计 34988 个有效样本单元。根据本研究所需要的变量，剔除了所有涉及题项中受访者回答为不确定、不知道、拒绝回答

以及受访者填写不全的, 最终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为 31125, 其中 CGSS2013 为 10020 个, CGSS2015 为 9812 个, CGSS2017 为 11293 个; 男性占比 48.5%, 女性占比 51.5%; 平均年龄为 50.09 岁 ($SD = 16.40$)。

2.2 变量及研究方法

2.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的生育意愿。个体的理想子女数是生育意愿的一种重要测量方式 (贾志科, 罗志华, 2018)。本研究选取了问卷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 您希望有几个孩子?”这一题项的结果代表个体的生育意愿。从结果来看, 生育意愿在 3 个孩子及以上的个体占比为 16.8%, 生育意愿为 2 个孩子的个体占比 63.0%, 而生育意愿在 1 个孩子及以下的个体占比 20.2%。

2.2.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公平感知, 主要关注个体对社会公平与否的整体感受。CGSS 问卷中关于社会公平感知的测量题项为: “总的来说, 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受访者将根据自身感受在五级量表上进行打分 (1=完全不公平, 5=完全公平)。

2.2.3 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 (卢秋佳等, 2018)。除了个人因素之外, 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是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对个体相对于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 通常包括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三个方面 (胡荣, 林彬彬, 2020)。为了控制住上述因素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了问卷数据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主观社会阶层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为了排除时间的影响, 年份也被纳入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年龄变量分为“生育年龄前 (22 岁以前)、生育年龄 (22 岁~45 岁) 和生育年龄后 (45 岁之后)”三类, 并以“生育年龄”为参照将年龄变量转化为 2 个哑变量; 根据 CGSS 提供的数据以及前人的研究, 我们将婚姻状况变量分为“未婚、同居、已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4 种情况, 并以“未婚”为参照将婚姻状况变量处理为 3 个哑变量; 年份变量则以“2017 年”为参照转化为 2 个哑变量。我们将教育程度变量分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小学/私塾、初中、职高/普高/中专/技校、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7 种情况, 并从 1~7 依次赋值。收入水平变量的值是由问卷中“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这一题项所得, 根据前人研究对收入变量的处理方法, 我们将收入取对数纳入模型。主观社会阶层变量源自问卷中的 1~10 的梯度表, 受访者将对题项“综合看来, 在目前这个社会上, 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进行打分, “10 分”代表最顶层, “1 分”代表最底层, 然后按照

受访者所填的答案对该变量从 1 到 10 进行赋值。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N=31125$)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因变量	生育意愿	2.06	0.98	0~29
自变量	社会公平感知	3.11	1.04	1~5
	教育程度	3.16	1.45	1~7
	收入水平	29629.44	54405.49	0~1000000
	社会阶层	4.26	1.67	1~10
控制变量	性别	/	/	0/1
	年龄	50.09	16.40	17~103
	婚姻状况	/	/	1~4
	年份	/	/	2013/2015/2017

2.2.4 研究策略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分析。所建立的模型公式为：

$$\text{Model 1: } Y = \beta_0 + \beta_1 * \text{公平感知} + \mu$$

$$\text{Model 2: } Y = \beta_0' + \beta_1' * \text{公平感知} + \beta_2' * \text{教育程度} + \beta_3' * \text{收入水平} + \beta_4' * \text{社会阶层} + \beta_5' * \text{性别} + (\beta_{61}' * \text{生育年龄前} + \beta_{62}' * \text{生育年龄后}) + (\beta_{71}' * \text{同居} + \beta_{72}' * \text{已婚有配偶} + \beta_{73}' * \text{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 + (\beta_{81}' * 2015 \text{ 年} + \beta_{82}' * 2013 \text{ 年}) + \mu'$$

其中， Y 为因变量生育意愿； β_1 和 β_1' 分别为自变量公平感知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beta_2 \sim \beta_8$ 分别为各个控制变量在模型 2 中的回归系数； β_0 和 β_0' 为在两个回归模型中的常数项， μ 和 μ' 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将主要检验回归系数 β_1 和 β_1' 的方向及显著性。

2.3 结果与讨论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模型 1 中，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生育意愿随着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强而提高。

而模型 2 中，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主观社会阶层和年份七个变量后，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受访者的性别会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且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的生育意愿；受访者的年龄对其生育意愿也会产生影响，在其他条件既定时，个体生育年龄前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生育年龄时的生育意愿，但生育年龄后的生育意愿却显著高于生育年龄时的生育意愿；婚姻状况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影响，相比未婚群体，同居和已婚有配偶群体，甚至是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群体的生育意愿都显著高于未婚群体。就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会越倾向于少生孩子；此外，随着社会阶层越来越高，个体会倾向于多生孩子；但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个体收入水平

越高，生育意愿却逐步降低。最后，年份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排除了时间可能存在的干扰性。

表 2 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Model 1	Model 2
社会公平感知	0.072*** (0.005)	0.040*** (0.005)
教育程度		-0.118*** (0.004)
收入水平		-0.038*** (0.004)
社会阶层		0.034*** (0.003)
性别 (1=女, 0=男)		-0.084*** (0.011)
年龄以生育年龄为参照组		
生育年龄前		-0.109*** (0.038)
生育年龄后		0.184*** (0.013)
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组		
同居		0.242*** (0.055)
已婚有配偶		0.082*** (0.023)
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		0.267*** (0.028)
年份以 2017 年为参照组		
2015 年		0.021 (0.013)
2013 年		-0.013 (0.013)
常数项	1.839*** (0.017)	2.141*** (0.036)
调整后 R ²	0.006	0.078
F 值	F (1,31123) = 182.28***	F (12,31112) = 220.0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考虑到样本中理想子女数的最大值是 29 个，根据常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常理。因此我们剔除了 286 个理想子女数高于 5 个的异常值样本（样本中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加上 3 个标准差的数值为 5.01），对剩余的 30839 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与上文中一样的回归模型（Model2）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仍然为正向且显著（ $b = 0.040, SE = 0.004, p < 0.001$ ）。

综上，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个体社会公平感知逐渐增强，生育意愿也随之不断提高。然而，研究 1 只是通过二手数据简单探讨了社会公平感知和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社会公平感知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通过实验来进一步探究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心理机制。

3 研究 2：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

研究 2 采用了随机分组的实验来验证社会公平感知和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我们首先操纵了被试的社会公平感知，然后再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和实验设计

本研究以社会公平感知为自变量，生育意愿为因变量，采用单因素 2 水平（社会公平感知：公平 vs. 不公平）组间实验设计，所有被试都被随机分到 2 组中的任意 1 组。实验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进行发放（每位被试将获得一定报酬），共回收 415 个样本，其中女性占比 44.1%；平均年龄为 30.97 岁（ $SD = 8.47$ ）；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占比 81%；平均年收入为 15.36 万元（ $SD = 15.85$ ）。本实验在开始收样本之前就已经在第三方学术公开平台 aspredicted.org 提前公布了所有实验流程、测量和计划收集的样本数量，实验的预注册公开报告可以在第三方学术平台 https://aspredicted.org/blind.php?x=/X8V_T2S 找到。预注册能有效保障实验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Moore, 2016）。

3.1.2 实验材料与程序

首先，参考胡小勇等对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方法（胡小勇等, 2016），本研究修改了《新浪财经》、《搜狐新闻》和《人民日报》等国内权威媒体中有关我国经济发展及贫富差距现状的报道，分别撰写了经济公平和经济不公平两个情境的操纵材料。其中，操纵感知公平的材料以“我国社会逐步实现收入公平，贫富差距不断缩小”为标题，操纵感知不公平的材料以“我国社会呼唤收入公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标题。实验开始后，所有被试首先阅读了两则操纵材料中的其中一则。

随后，为了检验社会公平感知是否操纵成功，被试回答了以下问题：“总体而言，你觉得我国社会公平吗？（1=非常不公平；7=非常公平）”为了测量生育意愿，我们采用了 CGSS 问卷中的测量问题，让被试回答：“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你希望一共有____个孩子。”为了排除操纵材料可能存在的其它干扰，我们测量了操纵材料的可读性（1=一点也不懂；7=完全能读懂）。最后，被试回答了一些基本的人口统计学问题。

3.2 结果

3.2.1 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检验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操纵材料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启动是否有效。我们以被试的社会公平感知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来自公平组的被试确实感知到社会更加公平（ $M_{\text{公平}} = 4.55, SD = 1.39$; $M_{\text{不公平}} = 4.01, SD = 1.41$; $F(1,413) = 15.66, p < 0.001, \eta_p^2 = 0.037$ ），说明我们的社会公平感知操纵成功。此外，以可读性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两则材料的可读性并没有显著差异（ $M_{\text{公平}} = 5.76, SD = 1.05$; $M_{\text{不公平}} = 5.85, SD = 1.01$; $F(1,413) = 0.82, p = 0.365$ ），说明可读性不会对生育意愿的结果造成影响。

3.2.2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成功操纵了被试社会公平感知的基础上，我们对两组被试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公平组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不公平组（ $M_{\text{公平}} = 1.92, SD = 0.70$; $M_{\text{不公平}} = 1.73, SD = 0.64$; $F(1,413) = 8.34, p = 0.004, \eta_p^2 = 0.020$; 如图 1），即感觉社会公平的被试比感觉社会不公平的被试愿意生更多的孩子，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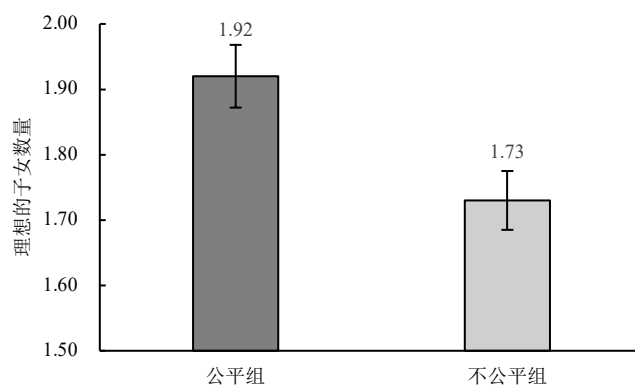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3.3 讨论

研究 2 采用实验法，通过情境材料启动被试不同水平的社会公平感知来探究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生育意愿也会更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感知不公平会增加人们社会比较的倾向（Cheung & Lucas, 2016），即当感觉社会不公平时，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更加频繁地与他人进行比较，比较得到的结果也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决策。比如在感知不公平时，个体在比较过程中可能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自己的同事、朋友或者邻居，在考虑是否生更多孩子的时候，这种比较就会引导个体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像其他家长一样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是否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在这种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个体的生育意愿就会降低。相反的，在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时候，个体在考虑是否要更多孩子时就不大会和他人进行过多的社会比较，因此也就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研究 3 引入社会比较为中介变量并直接测量，通过实验来检验社会比较在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路径中的中介作用。

4 研究 3：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影响

研究 3 直接测量了人们的社会比较倾向，探究了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

4.1 研究方法

4.1.1 被试和实验设计

本研究同样采用单因素 2 水平（社会公平感知：公平 vs. 不公平）组间实验的设计，将所有被试

随机分到 2 组中的任意 1 组，通过情境材料启动被试不同水平的公平感知。实验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进行发放（每位被试将获得一定报酬），共回收问卷 417 份，其中女性占比 96.9%；平均年龄为 28.52 岁（ $SD = 6.91$ ）；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 75.5%；平均年收入为 22.07 万元（ $SD = 17.75$ ）。本实验的预注册报告在 https://aspredicted.org/blind.php?x=/CWD_Q4V 可见。

4.1.2 实验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所使用的情境启动材料同研究 2 中所使用的完全相同。为了完成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被试首先被随机分配阅读两则材料中的一则。随后，被试回答了操纵检验的题项：“总体而言，你觉得我国社会公平吗？（1=非常不公平，7=非常公平）”为了测量社会比较的倾向，被试回答了社会比较量表：“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中，你觉得计划要不要生二胎或者更多孩子的时候，多大程度上需要考虑以下方面因素：（1）比较自己与周围其他人的收入差距；（2）与有钱人相比，考虑自己是否能够给孩子（们）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去好的私立学校、报名各种课外辅导班等）；（3）与有钱人相比，考虑自己家的条件是否能够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上（1=一点也不需要，7=非常需要；Richins, 1991; Cronbach's $\alpha = 0.63$ ）。”随后，被试回答了测量生育意愿的问题：“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你希望一共有____个孩子。”最后我们对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统计。

4.2 结果

4.2.1 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检验

我们对两组被试的社会公平感知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公平组的社会公平感知显著高于不公平组（ $M_{\text{公平}} = 4.51, SD = 1.34; M_{\text{不公平}} = 4.22, SD = 1.30; F(1,415) = 5.21, p = 0.023, \eta_p^2 = 0.012$ ）。因此，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成功。

4.2.2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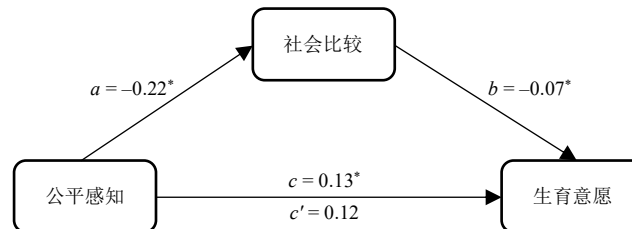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对两组的生育意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公平组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不公平组的生育意愿（ $M_{\text{公平}} = 1.79, SD = 0.65; M_{\text{不公平}} = 1.65, SD = 0.66; F(1,415) = 4.29, p = 0.039, \eta_p^2 = 0.010$ ），即增加社会公平感知能显著促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

4.2.3 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先以社会比较为结果变量，对两组的社会比较倾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来自公平组的被试比来自不公平组的被试有更低的社会比较倾向（ $M_{\text{公平}} = 5.21, SD = 1.03; M_{\text{不公平}} = 5.44, SD = 0.87; F(1,415) = 5.63, p = 0.018, \eta_p^2 = 0.014$ ）。

接下来，以社会公平感知为自变量（0=不公平，1=公平），以生育意愿为因变量，以社会比较为中介变量，用 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对该中介效应进行检验（Hayes, 2017; 中介模型 4, 重复抽样数为 5000, 置信区间的置信度为 95%）。如图 2 所示，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 = 0.016, $SE =$

0.010, 95% CI [0.0008, 0.0381]); 此外,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总效应也显著 (总效应 = 0.133, $SE = 0.064$, 95% CI [0.0069, 0.2597]), 而在加入中介变量社会比较后,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变成了边际显著 ($b = 0.118$, $SE = 0.065$, $p = 0.069$, 95% CI [-0.0091, 0.2445])。中介模型的统计结果表明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通过人们的社会比较倾向造成的。也就是说, 当人们感知到社会不公平的时候, 人们会更倾向于和他人进行比较, 从而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



*表示 $p < 0.05$

图2 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路径机制系数

4.3 讨论

研究3在研究2的基础上, 通过实验法进一步探究了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结果发现, 当个体感知到不公平时, 就会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 从而降低生育意愿。根据我们对社会比较的直接测量可以发现, 当个体感知不公平时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担抚育多个孩子的压力, 进而降低了生育意愿。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论, 当个体在感知不公平的情况下, 向上的社会比较会降低个体的生育意愿。然而, 向下的社会比较指个体同比自己条件差的人比较, 这种比较不太会降低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就是说, 社会比较的方向会调节不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4直接操纵个体社会比较的方向来进一步验证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

5 研究4: 社会比较方向的调节作用

5.1 研究方法

5.1.1 被试和实验设计

研究4用直接操控社会比较方向的方式来验证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实验采用单因素3水平 (社会比较方向: 向上比较 vs. 向下比较 vs. 控制组) 的组间设计, 将被试随机分为3组, 通过回忆法启动被试不同经济状况下的不公平感知。实验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进行发放 (每位被试将获得一定报酬), 共回收问卷604份, 其中女性占比54.8%; 平均年龄为29.66岁 ($SD = 8.28$); 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0.6%; 平均年收入为15.30万元 ($SD = 16.53$)。本实验的预注册报告在 https://aspredicted.org/blind.php?x=/LLJ_X88 可见。

5.1.2 实验材料与程序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研究 4 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操纵被试的不公平感知。参考肖飒（2018）的实验材料设计，在向上比较组的被试回忆了一个比她/他家境好很多、富有很多的朋友；在向下比较组的被试回忆了一个比她/他家境差很多、贫穷很多的朋友；在控制组的被试则回忆了一个跟她/他家境差不多、拥有财富差不多的朋友。

在被试按照要求写完相应的文字描述后，我们对其公平感知进行了测量，题项同样为“总体而言，你觉得我国社会公平吗？（1=非常不公平；7=非常公平）。”随后，我们测量了被试的生育意愿，同样以理想子女数为测量核心指标。最后对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统计。

5.2 结果

5.2.1 社会公平感知的操纵检验

我们对三组被试的社会公平感知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组被试的公平感知存在显著差异（ $F(2,601)=3.29, p=0.038, \eta_p^2=0.011$ ），其中，向上比较组的公平感知（ $M=3.91, SD=1.46$ ）显著低于控制组（ $M=4.24, SD=1.48; F(1,601)=5.13, p=0.024, \eta_p^2=0.008$ ）；向下比较组的公平感知（ $M=3.91, SD=1.43$ ）也显著低于控制组（ $M=4.24, SD=1.48, F(1,601)=5.00, p=0.026, \eta_p^2=0.008$ ）；向上比较组和向下比较组的公平感知并无显著差异（ $M_{\text{向上比较}}=3.91, SD=1.46; M_{\text{向下比较}}=3.91, SD=1.43; F(1,601)<0.01, p=0.987$ ）。因此，本实验对社会比较方向的操纵成功。

5.2.2 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随后，我们对三组被试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组被试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F(2,601)=6.19, p=0.002, \eta_p^2=0.020$ ；如图 3）。其中，向上比较组的生育意愿（ $M=1.71, SD=0.67$ ）显著低于向下比较组（ $M=1.99, SD=1.22; F(1,601)=9.26, p=0.002, \eta_p^2=0.015$ ）；向上比较组的生育意愿（ $M=1.71, SD=0.67$ ）也显著低于控制组（ $M=1.99, SD=0.90; F(1,601)=8.94, p=0.003, \eta_p^2=0.015$ ）；更重要的是，向下比较组的生育意愿（ $M=1.99, SD=1.22$ ）和控制组无显著差异（ $M=1.99, SD=0.90; F(1,601)<0.01, p=0.967$ ）。也就是说，在个体感到不公平且向上比较时，个体的生育意愿明显下降；但是向下的社会比较却对生育意愿没有影响，因此即使向下比较组的被试感知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也依然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生育意愿。本研究进一步展示了社会比较作为心理机制如何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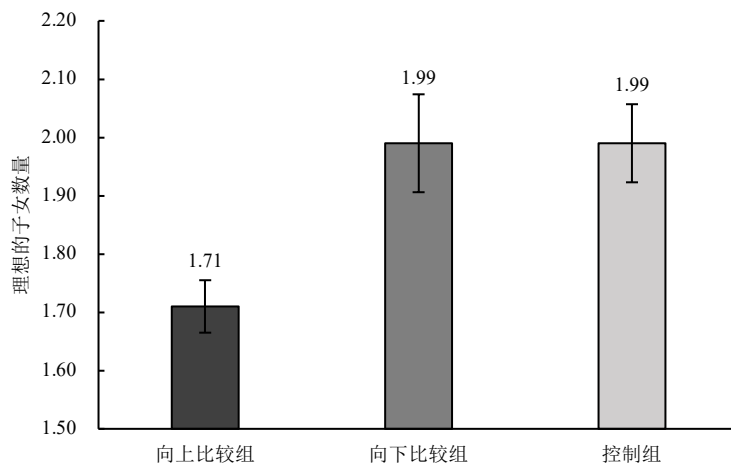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比较方向的调节作用分析

6 讨论

本文基于最新公布的三期 CGSS 数据以及一系列随机分组的实验研究了社会公平感知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社会公平感知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公平感知能增加个体的生育意愿。第二，社会比较中介了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当个体感知到不公平时，人们会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这种向上的比较会增加个体感知的生育成本，进而降低生育意愿。第三，社会比较的方向调节社会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只有向上的社会比较会降低生育意愿，向下的社会比较不会影响生育意愿。

6.1 理论贡献

本研究有明确的理论贡献。首先，生育率持续低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如何提升生育率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和政府关心的重要议题（宋健，郑航，2021；Goldstein et al., 2009）。然而据我们所知，前人的研究主要研究了绝对的经济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例如总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会降低生育意愿，个人资源的匮乏也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等（Rayhan et al., 2018；张孝栋等，2021）。然而，几乎没有研究探讨过经济发展的相对公平感知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揭示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以大样本调查数据和实验数据相结合的方式揭示了社会公平感知通过社会比较能够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对生育率研究和社会公平感知相关的研究都有重要启示，揭示了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其次，“公平”、“平等”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提升人民的社会公平感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目标（郁建兴，任杰，2021）。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提出了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和目标，也是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冯霞，苏振华，2021）。当

前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重点在于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刘培林等, 2021），很少有文章从理论层面研究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意愿。因此本文研究社会公平感知对民众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探索共同富裕的后续影响、提升民众的生育意愿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再次，本研究引入了社会比较来解释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对社会比较的研究有明确的贡献。社会比较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了不同方向的社会比较能影响个体的自尊、情绪和亲社会动机等不同的结果（Suls et al., 2002; Präg et al., 2014），但是还没有研究发现社会比较能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本研究用中介（研究3）和调节（研究4）的方法分别展示了向上的社会比较如何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揭示了社会比较的一个新的结果变量。

最后，从生育研究的角度来看，曾有我国学者在系统回顾了生育意愿的研究后指出在该领域中“研究范式较为单一，多数研究局限于家庭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问题（吴帆, 2020）。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相结合能够促进生育意愿研究的理论发展，本研究同时结合了大样本数据分析和实验的研究范式，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首先揭示了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生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6.2 实践启示

有学者认为当前强调宏观人口目标的生育政策忽视了形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和群众需求，因此可能难见成效（郑真真, 2021）。比如有研究直接指出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提升民众的生育意愿效果十分有限，因为这样的政策忽略了影响民众生育意愿的具体心理机制（Jang et al., 2017）。本研究清晰地揭示了社会公平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根据具体的心理机制对促进社会公平感知、提升生育意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从根本入手，促进社会公平，减小贫富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 2021），在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要着重关注收入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调节过高收入，最终让整个社会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的社会公平感知。

其次，从心理机制入手，注重舆论导向、降低民众的感知不公平。许多研究都表明影视作品、媒体报道等所塑造的社会舆论能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龚超, 2014）。人们的感知不公平并不完全等于客观的不公平，因此要降低不公平的感知也可以从社会舆论导向入手，减少影视作品中“拜金”、“炫富”等元素，引导民众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只有降低民众的感知不公平才能减轻不必要的育儿压力，从而提升民众的生育意愿。

最后，扩大公立教育的服务范围和时长、降低育儿成本。杨成荣等（2021）认为教育不公平问题会导致生育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产生叠加效应，这直接抑制了“不敢生”群体的生育意愿，更坚定了“不想生”群体的不育决策，进而加剧我国人口结构的失衡程度。同样的，本研究发现感知不公平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觉得育儿成本中所需的教育投入太大。向上的社会比较导致人们觉得无法像别人一样为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教育资源。因此降低民众的教育投入是短期内提升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一方面要“堵”，继续落实“双减”政策，严格控制不合规合法的课外辅导班。另一方面也要“疏”，扩大公立教育的服务范围和时长、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家长期望孩子学习各种技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市场需求不会因为“双减”政策而消失，要真正消除人们对育儿成本的担忧需要公立教育机构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得孩子们在公立教育机构就能得到优质的教育机会。

7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 1 个包含 3 万多个样本、时间跨度长达 5 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解释了社会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公平感知程度越高，个体的生育意愿也越高。随后本文通过 3 个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公平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用中介和调节的方式揭示了向上的社会比较能够解释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前人研究大多关注绝对的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相对的公平感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理解生育率不断降低、根据心理机制制定相应的促生育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Ajzen, I., & Klobas, J. (2013). Fertility intentions: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mographic Research*, 29, 203–232.
- Austin, W., & Walster, E. (1974). Reactions to confirmations and disconfirmations of expectancies of equity and inequ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2), 208–216.
- Balbo, N., Billari, F. C., & Mills, M. (2013). Fertility in advanced societies: A review of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1), 1–38.
- Buunk, B. P., Collins, R. L., Taylor, S. E., Vanyperen, N. W., & Dakof, G. A. (1990).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omparison: Either direction has its ups and dow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6), 1238–1249.
- Chen, C. W., & Zhang, J. Y. (200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fairness perception on citizens' taxpaying behavior. *Management World*, (4), 57–65.
- [陈成文, 张晶玉. (2006). 社会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4), 57–65.]
- Chen, J. X., & Wang, L. J. (2021). Impact of personal factors on fertility desire at different stages——Evidence from CGSS2017 data.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6), 58–64.
- [陈建新, 王莉君. (2021).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CGS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 *调研世界*, (6), 58–64.]
- Cheung, F., & Lucas, R. E. (2016). Income inequ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s: The effect of relative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2), 332–341.
-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 Equal Opportunities. (2005). *Confronting Demographic Change: A New Solidarity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Green Paper* (Vol. 94).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Feng, X., & Su, Z. H. (2021).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An analysis based on expecta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cientist*, (5), 86–93.
- [冯霞, 苏振华. (2021). 经济发展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基于社会流动预期的分析. *社会科学家*, (5), 86–93.]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 Gerber, J. P., Wheeler, L., & Suls, J. (2018). A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meta-analysis 60+ years 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4(2), 177–197.
- Gilbert, D. T., Giesler, R. B., & Morris, K. A. (1995). When comparisons ari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2), 227–236.
- Goldstein, J. R., Sobotka, T., & Jasilioniene, A. (2009). 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4), 663–699.

Gong, C. (2014).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fostering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Hubei Social Sciences*, (7), 192–198.

[龚超. (2014). 论现代舆论引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运用. *湖北社会科学*, (7), 192–198.]

Goya-Tocchetto, D., & Payne, B. K. (2022).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s thought and ac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32(1), 146–161.

Gray, E., Evans, A., & Reimondos, A. (2013). Childbearing desires of childless men and women: When are goals adjusted?.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8(2), 141–149.

Gruder, C. L. (1977). *Choice of comparison persons in evaluating onesel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Publications.

Hu, R., & Lin, B. B. (2020).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emale fertility desire. *Seeker*, (4), 142–148.

[胡荣, 林彬彬. (2020). 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 *求索*, (4), 142–148.]

Hu, X. Y., Guo, Y. Y., Li, J., & Yang, S. L. (2016).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mechanis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3), 271–289.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3), 271–289.]

Jang, I., Jun, M., & Lee, J. E. (2017). Economic actions or cultural and social decisions?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in shaping fertility inten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2(3), 257–275.

Jia, Z. K., & Luo, Z. H. (201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fertility desire research in China (1982 – 2016).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3(1), 152–160.

[贾志科, 罗志华. (2018). 我国生育意愿研究述评与展望(1982—2016 年).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1), 152–160.]

Lin, B., & Xie, C. C. (2019). Global experience on low-fertility issue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China.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4), 29–39+86.

[林宝, 谢楚楚. (2019). 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4), 29–39+86.]

Liu, P. L., Qian, T., Huang, X. H., & Dong, X. B. (2021). The connotation, realization path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Management World*, 37(8), 117–129.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董雪兵. (2021).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 *管理世界*, 37(8), 117–129.]

Lu, Q. J., Xu, L. S., Lu, H. Y., Huang, S. W., & Wei, Y. Z. (2018). Pension concept, fairness perception on the child-bearing

age popul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for second child.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1(6), 90–97.

[卢秋佳, 徐龙顺, 卢海阳, 黄森慰, 魏远竹. (2018). 养老观念、公平感知与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1(6), 90–97.]

Midgley, C., Thai, S., Lockwood, P., Kovacheff, C., & Page-Gould, E. (2021). When every day is a high school reunion: Social media comparisons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1(2), 285–307.

Miller, W. B., Bard, D. E., Pasta, D. J., & Rodgers, J. L. (2010). Biodemographic modeling of the links between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outcomes in the NLSY79. *Demography*, 47(2), 393–414.

Moore, D. A. (2016). Preregister if you want to. *American Psychologist*, 71(3), 238–239.

Newman, B. J., Johnston, C. D., & Lown, P. L. (2015). False consciousness or class awareness? Local income inequality, personal economic position, and belief in American merit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59(2), 326–340.

Präg, P., Mills, M., & Wittek, R. (2014).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Do social comparisons play a rol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2), 218–229.

Rayhan, I., Akter, K., & Islam, M. S. (2018).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ate decline in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A panel data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8(7), 21583–21589.

Research Group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Ma, J. T., Li, J. W., Zhang, L., Qian, C., & Li, H. S. (2022). Understand the basic laws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Management World*, 38(1), 1–19+34+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马建堂, 李建伟, 张亮, 钱诚, 李恒森. (2022). 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管理世界*, 38(1), 1–19+34+20.]

Richins, M. L. (1991). Social comparison and the idealized images of advertis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8(1), 71–83.

Rodgers, J. L., Hughes, K., Kohler, H. P., Christensen, K., Doughty, D., Rowe, D. C., & Miller, W. B. (2001). Genetic influence helps explain variation in huma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recent behavioral and molecular genetic stud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5), 184–188.

Schlosser, A. E., & Levy, E. (2016). Helping others or oneself: How direction of comparison affect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6(4), 461–473.

Schoen, R., Astone, N. M., Kim, Y. J., Nathanson, C. A., & Fields, J. M. (1999). Do fertility intentions affect fertility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3), 790–799.

Schor, J. B. (1998).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Smith, R. H. (2000). *Assimilative and contras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upward and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s*. Handbook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Research, 173 – 200.
- Song, J., & Zheng, H. (2021).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fertility research in China: Ob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114–125+128.
- [宋健, 郑航. (2021). 中国生育研究现状与问题——基于方法视角的观察. *中国人口科学*, (5), 114–125+128.]
- Spencer, S. J., Zanna, M. P., & Fong, G. T. (2005). Establishing a causal chain: Why experiments are often more effective than mediational analyses in examin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845–851.
- Suls, J., Martin, R., & Wheeler, L. (2002). Social comparison: Why, with whom, and with what effec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5), 159–163.
- Trent, R. B. (1980). Evidence bearing on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ideal family siz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3–4), 309–327.
- Wu, F. (2020). Review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Sociological Study*, 35(4), 218–240+246.
- [吴帆. (2020). 生育意愿研究: 理论与实证. *社会学研究*, 35(4), 218–240+246.]
- Xi, J. P. (2021).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Long March (Party Building Edition)*, (11), 4–7.
- [习近平. (2021).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新长征(党建版)*, (11), 4–7.]
- Xiao, S. (2018). *The effects of unfairness on selfish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compass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肖飒. (2018). 不公平感对自私行为的影响: 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 Xin, C., Meng, Y. Q., Lin, Q. Q., & Qin, Z. Y. (2019). Effect of childbearing deadline on women’s wanted fertilit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4), 428–436.
- [邢采, 孟戡琦, 林青青, 秦子玉. (2019). 生育年龄限制感提高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 *心理学报*, 51(4), 428–436.]
- Yang, C. R., Zhang, Y. S., & Zhang, H. (2021). Basic education equ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World*, 37(10), 152–166.
- [杨成荣, 张屹山, 张鹤. (2021). 基础教育公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管理世界*, 37(10), 152–166.]
- Yang, K. C., & Hu, P. H. (2018).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o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32(2), 15–22.
- [杨奎臣, 胡鹏辉. (2018). 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与亲环境行为——基于 CGSS2013 的机制分析.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32(2), 15–22.]
- Yu, J. X., & Ren, J. (2021).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olicy agenda.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13–25+159–160.

[郁建兴, 任杰. (2021).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 *政治学研究*, (3), 13–25+159–160.]

Zhang, C., Chen, Y. X., & Liao, H. Y. (2019).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nese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o have a second child: Based on CGSS2015 data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Society*, 35(5), 71–80.

[张冲, 陈玉秀, 廖海亚. (2019).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5 年数据分析. *人口与社会*, 35(5), 71–80.]

Zhang, X. D., Zhang, Y. L., Jia, G. P., Yang, M. J., Chen, G., & Zhang, L. (2021). Research progress on low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7(6), 9–21.

[张孝栋, 张雅璐, 贾国平, 汤梦君, 陈功, 张蕾. (2021). 中国低生育率研究进展: 一个文献综述. *人口与发展*, 27(6), 9–21.]

Zheng, Z. Z. (2021). Multiple driver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China as seen from Asi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65–85+205.

[郑真真. (2021). 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 从亚洲看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 (3), 65–85+205.]

How Does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Affect People's Fertility Intention?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

Yang Zheshuai¹, Dai Siqu¹, Zhao Dan^{2*}

¹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²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cord low fertility rate in recent years is a sign that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people's fertility intentions. [Methods] The current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perceived fairnes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with a large sample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and several experimental studies. [Results]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s that increased perceived fairness can reduc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lower perceived costs of childbearing, and consequently increase people's fertility intention.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parison directio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vs.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the aforementioned effect. [Conclusions] By combining large sample survey data and experimental dat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specif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is research thu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fertility policies.

Key words perceived fairness, fertility intention, social comparison, fertility policy